

ABC

英汉翻译

第2版

Second Edition

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郭富强 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

第2版

郭富强 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P.218H
51/0005

本书结合了作者多年的英汉翻译教学经验与科研成果,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点,注重英汉语言差异的分析,将翻译理论、原则、方法和技巧运用到翻译实践中,强调了实践对翻译学习者的重要性,科学地安排了翻译实践内容。本书包括了中西翻译理论研究概述、不同语言层次的翻译技巧讨论、不同文体的翻译研究以及历年英语专业八级考试英汉翻译试题在内的篇章翻译实践等共9章内容,书后配有翻译练习的参考答案。

本书可作为英汉翻译课程的教程和自学课本,适用于英语专业学生和教学人员对该课程的自学或教学使用,也可供广大英汉翻译学习者和爱好者以及英语语言学习人员学习和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郭富强编著. —2版.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1

ISBN 978-7-111-13394-0

I. 英... II. 郭... III. 英语—翻译理论 IV. 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93600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北京市百万庄大街22号 邮政编码100037)

责任编辑:唐绮峰 版式设计:浦慧

保定市中华美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07年12月第2版第1次印刷

184mm×260mm·16.25印张·448千

0001—6000册

标准书号:ISBN 978-7-111-13394-0

定价:29.80元

凡购本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销售服务热线电话:(010) 68326294

购书热线电话:(010) 88379639 88379641 88379643

封面无防伪标均为盗版

再版前言

《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第1版于2004年1月出版以来,多次印刷,深受读者喜爱。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本书获得第五届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

通过近几年的英汉翻译教学及研究,笔者又积累了一些经验。为了使本书尽善尽美,也为了给读者的英汉翻译学习或教学等带来更多的帮助,本书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增减与修改。

1. 进一步充实了中西方翻译理论研究方面的知识。本书第一章详细介绍了我国和英美国家翻译理论研究,具体包括了我国的古代翻译活动及理论探索、近代翻译理论研究、现代翻译理论研究、当代翻译理论研究等方面,英国的古代翻译研究、近代翻译研究、现代和当代翻译研究,以及美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
2. 从句和长句讲解细化。从句和长句是英语特有的,使用频率很高,也是英语学习和翻译的难点和重点。英语句子之所以这么长,原因之一是其中能够包含多个从句,而对从句的理解和翻译正确与否将直接影响对长句的理解和翻译。因此,此次修订将从句和长句分为两章来进行讨论,这样能使学习者更系统、全面地掌握好英语从句和长句的翻译。
3. 加强翻译实践,使学习者做到学以致用。在讨论翻译技巧后,给出一定的例句,并做出详细分析,紧接着给出一定的练习,让学习者学后立即实践,做到学以致用。这种方式贯彻始终,体现了英汉翻译中实践的重要性。勤练笔,是提高英汉翻译的关键和行之有效的方法。这次修订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环节,给学习者足够的翻译实践空间。
4. 各级汉语标题后增加了英语标题。标题是每个章节要点的体现和概括,根据本人英汉翻译教学的经验,附上英语标题有助于教学人员的课堂教学,更有利于英语专业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
5. 增加了英语专业八级考试中的英汉翻译试题(1992年~2007年)、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使得学习者更全面地了解八级考试中英汉翻译的难易程度和基本要求,可用来衡量自己的翻译水平,也有利于备战八级考试。
6. 第1版中有些章节的例句比较单一或陈旧,不利于说明要点,此次再版,对此进行了充实或更换;同时还纠正了一些错字或打印错误,对整个排版也进行了优化,使之更加合理,方便读者使用。

此次再版,充分运用了英汉对比手段,分析英汉语之间的同和异,尤其是“异”,由此找到符合英汉语言基本特征的翻译技巧,同时也使得翻译学习者能“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更好地掌握翻译技巧,进一步加深对英语和汉语的理解;在强调理论性、实践性、实用性、普及性和新编排的基础上,发扬优点,改进不足。在编写修订过程中,参考了中外有关翻译论著和作品,尤其是从中选用了优秀的例句,由于篇幅有限,例句的出处未能一一列出,但相应著作的出处列于书后的参考文献中;在修改过程中,得到了苏州科技学院外语系领导和同事的关心和支持,书中有的修改或完善,部分来自于笔者所执教班级的课堂教学讨论,在此,对各类著作的作者、译者、同事以及同学表示深深的感谢。

最后要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使得再版书能很快与读者见面。尽管笔者兢兢业业、认真仔细地修改,但书中可能还有不足和疏漏之处,请专家与读者批评指正。

郭富强

2007年8月

前言

本书结合了作者多年的英语翻译教学成果,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点,注重英汉语言差异的分析,将翻译理论、策略、方法和技巧运用到翻译实践中。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对外交往更加广泛和深入,参与这一伟大事业的人越来越多。这对起桥梁作用的英语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中英译汉的教学显得尤为重要。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掌握这方面的知识,从而更好地参与社会工作和活动,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在为高校英语专业、非英语专业以及成人教育学生讲授英汉翻译课时,深深地体会到他们翻译知识的缺乏和对翻译知识的渴望,觉得我们翻译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对翻译教学进行系统研究,研究其教学方法、理论意义、实践方式、心理过程、教科书的撰写和编写模式等,培养学习者的兴趣,使他们很快产生想学、要学和好学的念头,轻松而高效地获取知识。

本书始于1998年笔者的有关翻译理论和实践的科研课题,而原形则来自笔者开设的英汉翻译课,至今有5个年头了。在此期间,每开一次课,都要对内容进行调整、修改、增加和完善,有的章节是完全重写的,这样的大动作前后至少进行过3次,最终成为今天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本书。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笔者一直本着这样的态度:高度负责,为读者带去他们所需的东西;务实高效,让他们在较短的时间里最大的收获;严肃认真,为传授国内外翻译理论与实践之精华作出贡献。基于这样的出发点,根据不同学习者的不同要求,本书尽可能体现以下特点:

理论性: 翻译理论是人们翻译实践的经验总结,能更好地指导和服务于翻译实践,使翻译工作做得更好。书中介绍了中外翻译经典理论,运用人们熟悉的翻译技巧和较新的翻译理论研究成果,如话语分析、语段翻译,使读者对翻译理论有较为全面的认识,更好地指导翻译实践。

实践性: 要做好翻译工作,译出精品,大量的实践不可或缺,这对初学者来说尤为重要。在每一点、每一小节的讲解中和每一章讲解后都设有翻译练习,这有利于学生边学边用。书后还备有十多篇不同体裁的英语原文,供学习者自学之用。为了便于自学者的自我评估,所有的翻译练习都备有参考译文,附在书后。

实用性: 目前,大多数翻译学习者都有着共同的目的:使自己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使自己的工作更方便,使自己的能力更全面,在竞争中可立于不败之地。因此,本书涉及了许多不同的文体,尤其是较实用的科技文体、应用文体、广告文体、文学文体等;选材较为广泛,许多来自现实社会生活中,力求达到实用性这一目的。

普及性: 考虑到学习者的英语水平不一,本书选用的实例有难有易,对难度大的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讲解,对容易的,则让读者自己试译,从而适用于不同层次的翻译学习者。

新编排: 这主要表现在:第一,讲练结合。在翻译理论与技巧的分析中,先举几例,用相关的翻译技巧进行详尽的解释和说明,并给出译文,紧接着又给出数例,要学习者进行实践,并在每例后留有翻译的空间,以激发学生的兴趣,提供了实践机会。第二,以段、篇翻译为主。作者在翻译教学或其他英语课程的教学,经常发现学生给出脱离语境、断章取义的“死译”。这也许是他们习惯做单句翻译练习造成的。因此在编写本书时,尽可能考虑这方面的因素。对一些翻译技巧运用的说明,有的借用英语句子,有的借用英语语段,而在节或章的后面的翻译实践和文体翻译讨论上都是采用语段,在书的最后一章提供了语篇翻译,这样有利于学习者全面提高翻译水平。这些练习的答案附在书末,以供参考。

这几大特点始终贯穿于本书,希望读者能从中受益。这也是本书作者所期盼的。尽管如此,书中还会有缺点或错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在撰写的过程中,作者参考了国内近年出版的许多有关著作和刊物,从中选用了一些练习和例句,汲取了不少的营养,有的出处在书中有所体现或列举在书后的参考书目中,有的因种种原因未能列出,在此对作者一并表示十分的感谢。此外,自1994年到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工作以来,笔者所从事的翻译方面的研究一直得到学院领导钟元凯院长、外语系许常凯和徐晓晴两届主任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后来笔者的恩师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博士生导师潘文国教授的鼓励可谓是及时雨,不可多得;朋友祝平博士提供了建设性的意见;笔者的夫人李伟在收集资料和考虑出版方面提供了不少的帮助和建议。没有他们的关心和帮助,本书难以完成,笔者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

1	第一章 文学文体的翻译	文学文体的翻译 章 1 章
5	第2节 科技文体的翻译	科技文体的翻译 郭富强 第 103
101	第3节 应用文体的翻译	应用文体的翻译 2003年11月 173
55	第4节 广告文体的翻译	广告文体的翻译 章 1 章
65	第九章 篇章翻译实践	篇章翻译实践 章 1 章
65	第1节 篇章专业八级考试情况	篇章专业八级考试情况 章 1 章
85	第2节 篇章翻译练习	篇章翻译练习 章 1 章
45	附录 翻译练习参考答案	翻译练习参考答案 章 1 章
45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章 1 章
121		参考文献 章 1 章
80		参考文献 章 1 章
80		参考文献 章 1 章
25		参考文献 章 1 章
83		参考文献 章 1 章
95		参考文献 章 1 章
93		参考文献 章 1 章
100		参考文献 章 1 章
104		参考文献 章 1 章
106		参考文献 章 1 章
111		参考文献 章 1 章
117		参考文献 章 1 章
121		参考文献 章 1 章
123		参考文献 章 1 章
133		参考文献 章 1 章
134		参考文献 章 1 章

目 录

再版前言

前言

第 1 章 中西翻译研究概述	1
第 1 节 中国翻译研究简介	2
第 2 节 英美翻译研究简介	10
第 2 章 英汉翻译的基本要求	22
第 1 节 翻译的原则和要求	23
第 2 节 翻译的基本步骤	28
第 3 章 词语的翻译技巧	42
第 1 节 引申翻译	43
第 2 节 褒义词、贬义词及中性词的翻译	47
第 3 节 词性转换翻译	51
第 4 节 增补翻译	60
第 5 节 省略翻译	68
第 6 节 重复翻译	75
第 7 节 科技术语和专有名词的翻译	83
第 4 章 简单句的翻译	92
第 1 节 简单句的拆译	93
第 2 节 特殊简单句的翻译	100
第 3 节 多个简单句的合译	104
第 4 节 英语被动句的翻译	109
第 5 章 从句的翻译	116
第 1 节 名词性从句的翻译	117
第 2 节 定语从句的翻译	121
第 3 节 状语从句的翻译	129
第 6 章 长句的翻译	133
第 1 节 长句的句法分析	134

第2节 长句的翻译策略.....	137
第7章 语段的翻译.....	145
第1节 语段翻译的优点.....	146
第2节 语段翻译的原则.....	152
第8章 文体与翻译.....	159
第1节 文学文体的翻译.....	160
第2节 科技文体的翻译.....	166
第3节 应用文体的翻译.....	173
第4节 广告文体的翻译.....	185
第9章 篇章翻译实践.....	193
第1节 英语专业八级考试英译汉.....	194
第2节 篇章翻译练习.....	201
附录 翻译练习参考答案.....	208
参考文献.....	247

方翻译理论研究有一定的理解,也有助于汉英翻译方法的学习,具体分两节

第1节:介绍了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的翻译观,从“文”与“质”之争,近代严复的“信达雅”,现代的茅盾、鲁迅、郭沫若的翻译思想,当代傅雷的“神似”翻译理论和钱锺书的“化境”说。

第2节:介绍了英美翻译理论研究,国外的翻译研究包括:古代的翻译活动,近代英美翻译理论研究、奈特的翻译原则和利奇氏的翻译理论,当代的文艺、语言学和文论的翻译理论研究。美国翻译研究起步较晚,主要在当代,但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节着重讨论了影响很大的美国翻译理论家及其成果,如奈达的翻译思想,纽马克的语言学翻译理论和韦努蒂的解构主义翻译思想。

第1章

中西翻译研究概述

A Brief Account of Chinese and Western Translation Studies

本章提要 Main Points of the Chapter

本章主要讨论中国翻译研究和西方翻译研究的发展状况,使学习者对中西方翻译理论研究有一定的理解,也有助于英汉翻译方法的学习,共分为两节。

第1节:介绍了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的翻译理论研究,如唐朝的“文”与“质”之争,近代严复的“信达雅”,现代的茅盾、鲁迅、林语堂等的翻译思想,当代傅雷的“神似”翻译理论和钱钟书的“化境”说。

第2节:介绍了英美翻译理论研究。英国的翻译研究包括:古代的宗教翻译活动,近代德莱顿的翻译研究、泰特勒的翻译原则和阿诺德的翻译见解,当代的文艺、语言学和文化的翻译理论研究。美国翻译研究起步较晚,主要在当代,但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节着重讨论了影响很大的美国翻译理论家及其成果,如奈达的翻译思想、雅克布森的语言学翻译理论和韦努蒂的解构主义翻译思想。

第1节 中国翻译研究简介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1. 古代翻译活动及理论探索 (Ancient Translation Activities and Theory Explorations: from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o the Opium War of 1840)

我国翻译活动历史悠久,早在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时就有一些口传的简短佛经译本,这是我国翻译的端倪。到东汉(25—220)和元代(1206—1368)就有了大规模的文字翻译活动,主要是佛经(Buddhist scripture)的翻译。从中国翻译史的角度看,东汉支谦的《法句经序》最早讨论了翻译问题:“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强调经文的翻译必须传递原文意义,译文要达意。《法句经序》可以说是国内首篇重要的译论,“因为这篇关于佛经翻译的专门论述不仅出现得最早,而且其中提出了一些十分重要的思想,例如关于翻译不易的思想,和质派的翻译主张”(王宏印,2003:11)。

第一个提出并运用翻译理论的是东晋(317—420)的佛教大师道安(312—385)。他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中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和“三不易”之说,即:

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咏叹,叮咛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已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

然《般若经》,三达之心,复面所演,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阿难出经,去佛未久,尊者大迦叶令五百六通,迭察迭书,今离千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岂将不知法者猛乎?斯三不易也。

涉兹五失本、三不易,译胡为秦,讵可不慎乎?

文中的“胡”指梵语,“秦”指汉语,“可”为“适合”之意,“委悉”的意思是“说的十分详细”,“咏叹”指佛经中的颂文,“义说”指梵本在叙述后另用韵文复述,“乱辞”指汉语韵文最后总结的韵语,“刈”为“划”,“三达之心”指佛三明,“叵阶”指“不可及”,“五百六通”指五百罗汉,“迭察迭书”指“相互审察校写”。

道安的“五失本”指翻译佛经时,五种情况下会失去本来面目,即:

- 梵语采用颠倒语序,翻译时要倒过来,以符合汉语语法;
- 梵经质朴,但汉人好用华丽的文言,翻译时要进行修饰,以适用汉语读者;
- 梵语佛经中经常有重复现象,翻译时要删去;
- 梵语佛经的结尾都有一小结,用来复述或解释,译时要删除;
- 梵语佛经在谈论别的事情时又会简述前面的内容,翻译时要删去(马祖毅,2004:38)。

“三不易”是指使得翻译工作不容易的三种情况,即:

- “圣人”本是按照当时的习俗来说法的,而今时代不同,要改古以适今,很不容易;
- “圣人”的智慧非凡人可及,而要把几千年前古代圣哲的微言大义传达给后世的浅俗之众,

很不容易;

- 释迦牟尼死后,其大弟子阿难等人出经时尚反覆斟酌,兢兢业业,而今却要由平凡人来传译,更谈何容易。(陈福康,1992:19-20)

“五失本”和“三不易”尽管是针对梵语佛经翻译成汉语的情况,实际上指出了翻译中要注意的问题,以及会遇到的困难,对梵语佛经的翻译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以后的翻译实践和研究提供了借鉴。钱钟书在《管锥篇》中对《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吾国翻译术开宗明义,首推此篇”。

与道安同期的另一翻译研究人士是鸠摩罗什(344-413),后秦僧人,华名童寿,祖籍天竺(印度),译著颇丰,据说有四百卷之多,是我国古代著名的译经大师。张培基对他的翻译作品和翻译研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鸠摩罗什“批评了翻译的文体,检讨了翻译的方法。他全改以前的古直风格,主张意译,改正了过去音译的弱点,并提倡译者署名。……见到他译的《法华经》的人说,他的译著有‘天然西域之语趣’,表达了原作神情,译文妙趣盎然,为我国翻译文学奠定了基础”(张培基等,1980:1)。

唐朝(618-907)出现了“文”(expressiveness)与“质”(faithfulness)之争:“文”强调翻译中的修辞和通顺,而“质”则强调翻译时不增不减,即翻译的忠实性。这实际上是意译与直译之争的开始,开启了我国翻译标准的讨论。这一期间,唐朝名僧玄奘(600-664)开创了我国译经史的新风格,提出了著名的“五种不翻”:

- 秘密故,如“陀罗尼”;
- 含义多故,如“薄伽”,梵具六义;
- 此无故,如“阎浮树”,中夏实无此木;
- 顺古故,如“阿耨菩提”,非不可翻,而摩腾以来,常存梵音;
- 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

玄奘的“五种不翻”并不是不要翻译的五种情况,而是指采用现代意义的“音译”方法,即“不翻之翻”,不翻的主要是神秘语、多义词。由于梵语与汉语的差异,有些梵语词语不能或不必要按照意义译成汉语,而要保持原语音的汉字写法。玄奘在译经时运用了一系列的翻译技巧,如补充法、省略法、变位法、分合法、译名假借法、代词还原法等(马祖毅,2004:66-67)。与玄奘同时代的还有实叉难陀、义净、不空等人,他们也翻译了不少佛经。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翻译以佛经翻译实践活动为主,其中的理论是零星的、片段的,缺乏系统性,是佛经翻译实践的总结,但对我国后来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作用。

2. 近代翻译理论研究 (Translation Theory Studies: from the Mid-19th to the May 4th Movement of 1919)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大门被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打开,标志着西学东渐的开始,中国传统的佛经翻译也因此受到巨大影响和冲击。这一阶段我国的翻译主要以介绍和探讨西欧各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为翻译实践和研究的主流,代表人物有徐光启、林纾和严复等人。

中国近代最早对翻译问题发表较多议论的是冯桂芬(1809-1874)。他重视翻译工作,曾在上海“设广方言馆,求博通西学之才,储以济变”(见《清史稿》)。在1861年出版的代表作《校邠庐抗议》中的《采西学议》一文中,冯氏论述了翻译事业的重要意义,建议创办“翻译公所”,

认为翻译工作是“天下第一要政”(陈福康, 1992: 84—88)。入清以后, 科技翻译活动(主要是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更为盛行。徐光启和利玛窦于 1607 年翻译刊行的《几何原本》前六卷, 之后李善兰与英国人伟烈亚力翻译了《几何原本》的后九卷, 于 1857 年在国外出版。我国较早讨论科技翻译理论的是英格兰人傅兰雅(1839—1928), 他在华任职三十余年, 直接从事科技翻译工作达二十多年。傅兰雅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中阐述了译学主张, 主要有三点(陈福康, 1992: 84—98):

- 驳斥了汉语难译科技书的说法, 指出中国也可以创造科技新词汇;
- 最早倡导科技译名统一, 并制订了译名的具体规则;
- 论述了翻译科技书的选择方法, 以及中西译者如何配合的问题。

马建忠(约 1845—1900)的《拟设翻译书院议》是中国近代译学史上的著名篇章, 文中提出了“善译”的标准: “能使阅者所得之益处, 与观原文无异。是则谓善译也已。”他呼吁尽快翻译西书, 以反抗外国的欺侮: “窃谓今日之中国, 其见欺于外人也甚矣!”。值得一提的是, 马建忠于 1898 年问世的《马氏文通》是我国第一部运用西方语法理论来研究古汉语的语法著作, 开辟了中西对比语言学的先河, 为汉语研究和我国翻译理论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国近代翻译实践和理论上真正称得上有建树的是严复。严复(1854—1921), 字又陵, 福建侯官人(今福州)人, 是清末新兴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1895 年甲午战争后, 他决心致力翻译, 以开启民智, 救亡图存。从 1898 年到 1912 年的十多年间, 严氏翻译了许多西方政治经济方面的著作, 如赫胥黎(T.H. Huxley)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斯宾塞(H. Spenser)的《群学肄言》(*Study of Sociology*)、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约翰·穆勒(J. S. Mill)的《群己权界论》(*On Liberty*)和《穆勒名学》(*A System of Logic*)、孟德斯鸠(C. L.S. Montesquieu)的《法意》(*Spirit of Law*)等。由于有了明确的目的, 严复的译作打开了国人的眼界, 使他们真正认识了“西学”的精华。在翻译过程中, 他还加入了大量的按语, 发表自己的看法, 以利于帮助读者的理解, 达到变法图强之目的。

严复不但是翻译家, 也是翻译理论家, 他的“信、达、雅”是对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最大贡献。严氏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第一段中指出:

译事三难: 信、达、雅。求其信, 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 虽译犹不译也, 则达尚焉。

其中, “信”(faithfulness)指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 “达”(expressiveness)指译文通顺流畅, “雅”(elegance)则表示译文要有风采, 文字典雅。在《译例言》第一段, 作者还论述了三者的关系:

《易》曰: “修辞立诚”。子曰: “辞达而已!”又曰: “言之无文, 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 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 求其尔雅。

严复强调, 译文首先要求其信, 但如不达则好像没有翻译, 在保证“信”和“达”之后, 力求“雅”, 讲究“修辞”, 使得译文有“文采”。

严复的翻译标准对我国的翻译理论研究与实践的指导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此以后成为我国翻译学界讨论的焦点, 乃至出现了这样的情形: 讨论翻译, 必然谈到“信、达、雅”, 否则就无法讨论翻译理论, 就不懂翻译了。大多数学者对严复的观点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梁启超认为, “近人严复, 标信、达、雅三义, 可谓知言”。1954 年 8 月, 郭沫若在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把信达雅作为翻译标准的看法, 他说: “严复对翻译工作有很多贡献, 他曾经主张翻译要具备信、达、雅三个条件。我认为他这种主张很重要的, 也是很完备的。翻译文学作品尤其需

要注意第三个条件,因为译文同样应该是一件艺术品。”张培基等(1980: 4)也提出肯定的看法:“由于时代不同,严复对‘信、达、雅’翻译标准的解释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许多年来,这三个字始终没有被我国翻译界所废弃,原因在于:作为翻译标准,这三个字的提法简明扼要,又有层次,主次突出;三者之中,信和达更为重要,而信与达二者之中,信尤为重要”。但也学者提出了异议,黄雨石在《英汉文学翻译探索》一书中说:“‘译事三难:信、达、雅’的提法本身便包含着极大的逻辑混乱……所谓‘三难’说,不仅‘信’和‘达’是陪衬,连这个‘雅’字也只是个借口。”无论如何,严复的翻译标准对我国翻译研究及其理论的建设有深远的影响,大大推动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同时,我们也应该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严复的翻译标准,这样才有助于我国翻译理论的研究。

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与严复并列的翻译大家要算林纾(1852—1924),福州人,字琴南。虽然林琴南不懂外语,但通过合作者的口述,先后翻译了外国文学作品180余种,其中小说163种,涉及了英、法、美、俄、日本、比利时、瑞士、挪威、西班牙等11个国家的98个作家的作品,如此之多,也实属罕见。他翻译的作品大多数为名著,如《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块肉余生述》(今译《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等。林纾是我国近代翻译西方小说的第一人。他认为只有发展翻译事业,才能开启民智。关于翻译原则,他在《剑底鸳鸯序》中提出了“存其文不至踵其事”的要求,强调外国作品中有不少内容我们不必赞同,但其译文必须忠实原著。康有为在《琴南先生写万本草堂图,题诗见赠,赋谢》(《庸言》第1卷第7号,1912)给予了这样赞誉:“译才并世数严、林”。郑振铎(1924)的评价是:“在中国,恐怕译了四十余种的世界名著的人,除了林先生外,到现在还不曾有一个人呀!”

章士钊及其《论翻译名义》。章士钊(1881—1973),湖南长沙人。在我国近代翻译史上,他较早地、有系统地开展了西方术语专有名词翻译方法的讨论,尽管他提出的义译和音译的手段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但为术语的翻译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经验。他在《论翻译名义》中对国外新学术词汇的翻译问题发表了较为系统的观点。文章以问题的方式提出了学术词汇翻译中义译(意译)和音译的问题,具有玄学的思辨深度,如“以义译名,果能得吻合之译语乎?”“以义译名,弊害何在?”“以音译名,利弊何在?”另外,在词语的翻译上,胡以鲁也发表了长篇文章《论译名》,全面讨论研究了译名中的义译和音译问题。文章比较系统地分析了晚清以来主张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的翻译理论,提出了义译的原则。该文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极大推动了我国译名问题的讨论和研究。

中国近代翻译研究突破了古代宗教翻译领域,大量开展科技、文学和社会科学等方面的翻译活动,试图通过翻译来引入和学习西方科技,达到“超胜”的目的,反映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摆脱了以前的那种宗教的功利目的。

3. 现代翻译理论研究 (Modern Translation Theory Studies: from the Beginning of 20th to 1949)

我国现代翻译理论研究主要指二十世纪初到1949年三十多年的时间所进行的翻译活动和理论研究。这段时期中国译坛明星叠出、翻译研究硕果累累,迎来了翻译事业的新时期,为我国翻译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和学科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921年1月4日成立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成员最多的著名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该会是中国现代史上对文学翻译事业贡献最大的团体,其主要领导人是郑振铎和茅盾等人。郑振铎在翻译理论研究方面的贡献不可忽视。针对当时关于文学作品是否能翻译问题,郑振铎明确指出:

我以为,文学书是绝对的能够翻译的,不惟其所含有的思想能够完全的由原文移到译文里面,就是原文的艺术的美也可以充分的移植于译文中——固然因翻译者艺术的高下有不同——不独理想告诉我们是如此,就是许多翻译家的经验的成绩,也足以表现出这句话是很对的。(选自《译文学书的三个问题》,1921年3月《小说月报》)

根据翻译实践和经验,郑振铎明确指出文学作品完全可以翻译,其中的思想和艺术也可以转换,为文学作品的翻译指明了方向。就文学翻译的作用,他说:

就文学的本身看,一种文学作品产生了,介绍来了,不仅是文学的花园,又开了一朵花;乃是人类的最高精神,又多一个慰藉之交通的光明的道路了。(选自《处女与媒婆》,1921年6月10日《文学旬刊》)

郑振铎十分重视文学翻译的作用,并认为“外国的文学作品对于我们是极有影响的”,丰富了我们的精神世界。在《译文学书的三个问题》中,他首次向国内翻译工作者介绍并且评述英国翻译家泰特勒的《论翻译的原则》一书。在1920年3月20日,郑振铎为耿济之等人翻译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写的序言中,强调系统翻译的重要性:“原原本本,有系有统”,他是我国较早提出翻译工作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学者。

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桐乡人。茅盾一贯十分重视翻译工作,在1921年4月10日的《小说月报》第12卷第4期发表了《译文学书方法的讨论》,其中对译者提出了明确的条件:

现在欲振刷译界对于从前习惯的惰性,一面固然全仗大家能以试验的态度、求真知的精神去奋斗,一面也不可不了解:

- 翻译文学书的人一定要他就是研究文学的人;
- 翻译文学书的人一定要他就是了解新思想的人;
- 翻译文学书的人一定要他就是有些创作天才的人。

这样的条件不低,也许很多翻译者难以达到,但是这些条件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文学翻译的难度和极高的要求,对翻译教学和人才培养有指导意义。在翻译理论研究上,茅盾从汉语的特点出发,提出了翻译中的“神韵”问题,要求译文充分利用“神气句调”,同意采用“直译”手段,但也指出了其中的不足:“翻译文学之应直译,在今日已没有讨论之必要;但直译的时候,常常因为中西文字不同的缘故,发生最大的困难,就是原作的‘形貌’与‘神貌’不是同时保留。”但茅盾更强调“神貌”在翻译中的重要作用:“就我的私见下个判断,觉得与其失‘神韵’而留‘形貌’,还不如‘形貌’上有些差异而保留了‘神貌’。……译本如不能保留原本的‘神貌’难免要失了许多的感人的力量。”茅盾在1937年1月16日《译文》新2卷第五期上发表的《〈简爱〉的两个译本》中讨论了“复译”的意义:“我们以为如果真要为读者的‘经济’打算,则不但批评劣译是必要的手段,而且主张复译又是必要的救济。”

在这一阶段另一位重要人物便是著名文学家鲁迅,他对翻译问题作了一系列的精辟论述,在翻译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1935年7月1日出版的《文学》第5卷第1期上刊登的《“题未定”草》里,他提出了自己的翻译观:“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原作的风姿……。”鲁迅关于翻译方面的论述涉及许多方面,并且很有深度,是不可多得的财富。鲁迅在翻译方面的论述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陈福康,1992:289—308):

1) 翻译的目的与宗旨。

鲁迅认为,翻译既是为了提高自己和解剖自己,又是为了帮助同一阵营里的文学工作者,其中也包括那些对革命理论所知甚多却“以无产阶级批评家自居的人”。

2) “直译”与“硬译”。

鲁迅提倡的“直译”是针对“歪译”的，他的“直译”实际上是“正译”，而不仅仅是相当于“意译”，包括正确的“意译”在内的“正译”。针对梁实秋的《论鲁迅先生的“硬译”》，鲁迅在1930年3月《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深刻阐述了“硬译”与“死译”的区别：“硬译”（主要指翻译科学的文艺论及其他革命理论著作）自有需要它的读者对象，它在他们之间生存；“硬译”不仅为了“不失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同时也可以“逐渐添加了新句法”，经过一段时间，可能“同化”而“成为己有”；自然，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鲁迅认为，“硬译”是自己在翻译理论书籍中尚未探索到更好的译法时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

3) 关于翻译的言语、句法问题。

鲁迅认为，中文文法本身是“有缺点”的，通过翻译而有所“新造”，是很自然的。针对有人提出的所谓“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鲁迅提出了“宁信而不顺”，以反对当时那种“牛头不对马嘴”、“削鼻剜眼”的胡译、乱译。他主张在翻译中容忍“不顺”，并非一种消极的办法，而是一种积极的主张，为的是“输入新的表现法”和改进中文的文法、句法。鲁迅还多次谈到“欧化”问题，在1934年7月25日《申报·自由谈》上发表的《玩笑只当它玩笑》中指出：“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文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固有的白话文不够用，便只得采些外国的句法。比较的难懂，不像茶淘饭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是真的，但补这缺点的是精密。”其目的是为了精准表达原文的内容。

4) 关于重译（转译）和复译问题。

鲁迅认为，理想的翻译，应该由精通原文的译者从原著直接译出，但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重译（转译）有其存在的必要，他极端反对不加分析地鄙薄重译的做法。至于复译，他说：“因言语跟着时代的变化，将来还可以有新的复译本的，七八次何足为奇，何况中国其实也并没有译过七八次的作品。”

5) 关于翻译批评问题。

在1938年8月14日发表的《为翻译辩护》中，鲁迅指出翻译批评包括三点：指出坏的；奖励好的；尚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他非常形象地提出了一种“吃烂苹果的方法”，“希望刻苦的批评家来做剜烂苹果的工作，这正如‘拾荒’一样，是很辛苦的，但也必要，而且大家有益的。”鲁迅是中国现代翻译理论研究中重视翻译批评建设的人。

最后，我们来看看陈西滢和林语堂的翻译研究。在《新月》1929年第2卷第4号，陈西滢发表了《论翻译》一文，文章就翻译的分类及严复的信、达、雅发表了颇有见解的讨论。他认为翻译大致可以分为文学和非文学两大类，指出：“在非文学的翻译，只要能信能达，便尽了译书者的能事”。“雅”字在非文学的作品里根本就用不着的。即使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雅”字是译者的大忌，甚至“‘达’字也并不是必要的条件，要是‘达’字的意义是‘明白晓畅’的话。”他认为，如果原文是不雅的、粗俗的，翻译者不能译成雅致的；如果原文晦涩、难懂，译者不能译成明白通畅。林语堂在1933年发表的《论翻译》一文中提出了三条翻译标准：“第一是忠实标准，第二是通顺标准，第三是美的标准”。他承认，这三条标准与严氏的信达雅大体上是正相比符，但从另一角度可以把这三条解释为译者的责任：“第一是译者对原著者的责任，第二是译者对中国读者的责任，第三是译者对艺术的责任。三样的责任心备，然后可以谓具有真正译家的资格。”

4. 当代翻译理论研究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y Studies: from 1949 to the Present Time)

当代翻译理论研究主要包括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所进行的翻译研究活动。新中国成立后, 翻译理论研究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涌现出了傅雷、钱钟书等著名的翻译理论家, 学科建设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1) 傅雷对译学的贡献 (Fu Lei's Contribution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傅雷 (1908—1966), 上海南汇人, 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开始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 在中国当代翻译界享有盛誉。他精通中国传统美学又受到西方古典艺术的影响, 其翻译作品具有明显的艺术特色, “神似”说便是这一方面的代表。

傅雷关于翻译问题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王宏印, 2003: 212—215):

1) 关于翻译与临画的关系, 以及“神似”与“形似”的问题。

在 1951 年的《高老头》重译本序中, 傅雷把翻译比作临画, 对它们之间的关系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以效果而论, 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 所求的不在形似 (formal conformity), 而在神似 (spiritual conformity)。以实际工作论, 翻译比临画更难。临画与原画, 素材相同 (颜色, 画布, 或纸或绢), 法则相同 (色彩学, 解剖学, 透视学)。译本与原作, 文字既不侔, 规则又大异。

在 1963 年给罗新璋的信中, 傅雷强调, 神似重于形似:

愚对译事看法实甚简单: 重神似不重形似; 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 无生硬拗口之病; 又须能朗朗上口, 求音节和谐。(罗新璋, 1984: 694)

2) 中西方语言与思维差异及汉语文言、白话与方言问题。

翻译不能不涉及语言问题, 翻译是一种以语言为转换媒体的实践活动, 其基础是两种语言之间的对比研究, 同时又是两种思维和文化之间的对比研究。傅雷根据自己深厚的中外文化修养, 在多年的法汉翻译活动中深刻地领略到中西语言及思维的差异, 并且用简洁、明确的语言进行了描述, 在《致林以亮论翻译书》中, 他说:

……民族的 mentality 相差太远。外文都是分析的, 散文的, 中文却是综合的, 诗的。这两个不同的美学原则使双方的词汇不容易凑合。本来任何译文总是在“过与不及”两个极端中荡来荡去, 而在中文尤为甚。

在《翻译经验点滴》中, 他作了这样的总结: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西方人的距离多么远。他们喜欢抽象长于分析; 我们喜欢具体, 长于综合。

傅雷注意到中西语言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西语之间的差异, 并且在其《高老头》重译本的序中作了十分精当的总结, 对翻译研究和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两国文字词类的不同, 句法构造的不同, 文法与习惯的不同, 修辞格律的不同, 俗语的不同, 即反映民族思维方式的不同, 感觉深浅的不同, 观点角度的不同, 风俗传统的不同, 社会背景的不同, 表现方式的不同。

……

各种文字各有特色, 各有无可模仿的优点, 各有无法补救的缺陷, 同时又各有不能

侵犯的戒律。像英、法、英、德那样接近的语言，尚且有许多难以互译的地方；中西文字的扞格远过于此，要求传神达意，铢两悉称，自非死抓字典，按照原文句法拼凑堆砌所能济事。

3) 翻译的神圣与译者的修养问题。

傅雷在《翻译经验点滴》等文章中很详细地阐述了翻译的神圣与译者的修养问题：

- 热爱文艺，视文艺工作为崇高神圣的事业；
- 选择作品好比交朋友，译书要认清自己的所长所短；
- 琢磨文字，锤炼语言，提高眼光，养成风格；
- 深入生活，了解社会，以伟大作家为楷模；
- 试译作为练习，最好从个人最喜欢之中短篇着手；
- 熟读精思，深刻体会原著，化为我有，然后才能动笔；
- 神似重于形似，传达原作精神，要又忠实，又动人；
- 艺术修养为根本，提高翻译者的综合素质。（王宏印，2003：212—215）

可以看出，傅雷十分重视翻译中的语言问题，并且就此作了许多的探索与实践，是继鲁迅之后对翻译语言研究贡献最大者。

(2) 钱钟书的“化境”说 (Qian Zhongshu's Theory of "Sublimed Adaptation")

钱钟书，江苏无锡人，我国著名的社会科学家之一，也是我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学者。他的“化境”说在翻译理论研究界倍受重视。“化境”说是钱先生在1979年发表的《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提出来的：

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sublimed adaptation)。十七世纪有人赞美这种造诣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s)，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

钱钟书的“化”被视作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翻译工作者努力的方向。在《林纾的翻译》（载于1964年6月《文学研究集刊》第1册）中，他还谈到了两种翻译方法：“欧化”和“汉化”，前者指“尽可能让外国作家安居不动，而引导我国读者走向他们能力去”，后者指“尽可能让我我国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外国作家走向咱们这儿来”。无论哪一种，“翻译总是以原作的那一国语文为出发点而译成的这一国语文为达到点”，是很艰苦的过程。此外，钱钟书撰写的翻译研究文章还有：《译事三难》（见《管锥编》，1979年中华书局版）、《翻译术开宗明义》和《译音字望文穿凿》等。

(3) 二十世纪末翻译理论研究 (Translation Theory Studies at the End of 20th Century)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的“文化大革命”使得我国的翻译研究也处于停止状态。之后，各行各业百废待兴，翻译研究也焕发生机。专家和学者纷纷为我国翻译理论研究添砖加瓦，为学科建设献计献策，涌现出一批新的翻译研究者，创建和恢复了一大批学术刊物。1977年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现在的对外语经济贸易大学）创刊《外语教学与研究》（季刊，1979年改为《外国语教学》，双月刊），1978年4月上海外国语学院（现在的上海外国语大学）创办学报《外国语》（季